

近百年來中外關係

胡秋原 著

近百年來中外關係

胡秋原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近百年來中外關係／胡秋原著。 ——初版——
台北市：海峽學術， 2004〔民93〕
面； 公分

ISBN 957-2040-94-4 (平裝)

1. 中國—外交關係—晚清（1840-1944）
2. 中國—外交關係—現代（1900- ）

641.45

93010621

近百年來中外關係

著者 胡秋原
發行人 黃溪南
主編 洪宜勇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 五九六三號
地址 (一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〇二) 二二六七七七八 傳真：(〇二) 二二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二三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一〇號一〇樓
電話：(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傳真：(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香港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香港)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三〇之三二號華耀工業中心十四樓一〇室
電話：(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八八 傳真：(八五二) 二六八七五〇〇五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一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宜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印刷所 興海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七三三六四三
定價 二五〇元(平裝)
出版 一九三〇年九月
撥帳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957-2040-94-4

※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胡秋原先生生平事略

何慶華

吾鄂胡公秋原先生，前清宣統二年端午日（庚戌，一九一〇年）誕生於黃陂縣胡家灣，取名曾佑，派名業崇。胡氏源自唐代江西胡安定堂，以明末之亂始遷湖北，定居黃陂，世以耕讀傳家。先生尊人康民公諱家濟，幼失怙，祖妣劉太夫人，茹苦撫孤，備極辛勞。康民公鄉試案首，品學著於鄉黨。適庚子拳亂，八國聯軍侮我中華，公思教育乃啓迪民智，強國富民之本，乃在家鄉設館授徒。母余太夫人，爲前清附生余瑞元公之次女，知書達理，治家有節。先生雁行七人，長姐清心，次弟業永，三弟業巨，二妹冰心均已辭世，四弟業健居美，幼妹覺正仍居湖北武漢。民國十年，康民公本教育桑梓子弟之職志，成立前川中學，先生爲前川中學第一批新生。

先生自幼好學，民國十三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在其畢業同學錄序文中，提出三觀念：「人格、國家、科學」，以科學報國爲志。翌年考入武昌大學理化系預科，此時已由族兄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在校時又經同學嚴君之引介，參加「共青團」。入學之初，先生已粗略接觸馬克斯、列寧主義、唯物史觀及尼采學說。時校內國民黨及左傾分子多方活動，先生一枝健筆，除參加國民黨機關報《武漢評論》編輯委員會外，每有學生運動，常爲雙方所爭取。

民國十六年，先生目睹共黨分子在武漢及鄉間之恐怖殘暴行爲，對所謂「革命」及政黨派系深感失望，決定脫離共青團及國民黨，並辭去《武漢評論》主編職務。但仍爲「全中國學生總會」主編「中國學生」。興趣轉向文藝，因喜王維「秋原人外閑」、柳永「夕陽島外秋風原上，目斷四天垂」句，乃以「秋原」爲筆名。

民國十五、六年寧漢戰事期間，武昌大學課業停頓，且因理化科師資匱乏，先生決定轉讀中國文學系。是年冬桂系軍入武漢，大舉搜捕左傾學生，先生及嚴君亦被株連。嚴君遇難，先生適因不在校中而倖免。當即返鄉避難，並兼程赴滬，以「胡秋原」之名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遂正式改名。

時值上海文藝界出版界風雲際會，國共兩黨各有組織。先生年未弱冠，即以《論革命文學問題》一文嶄露頭角。因研究樸列汗諾夫之理論，發表《文學起源論》，此即其「唯物史觀藝術論」之初稿。「五三慘案」後，先生以不及一月之時間，完成《日本侵略下之漢蒙》一書，由大東書局出版，備受歡迎，是爲先生初試啼聲，鳳鳴高崗。

當時中譯書籍尚未普及，先生遂決定赴日學習日文，以便閱讀更多日譯書籍。隨以高分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後因熊十力先生之薦，蔡元培先生之助，獲得湖北省官費補助。課餘之暇，先生研讀馬克斯、恩格斯全集，及其他西洋歷史哲學名著，筆耕不輟。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先生適在國內省親，以爲書生報國，正當其時，尤不能爲一紙文憑至敵國讀書，遂毅然放棄未竟之學業，留滬寫作維生，批判日本帝國主義，主張武力抗日。除參

加神州國光社之《讀書雜誌》外，並自力創辦《文化評論》週報，強調思想自由及文藝自由，批評左翼文藝限制創作方向及題材，自稱「自由人」，提出「文學藝術至死是自由的！」，呼籲「勿侵略文藝！」，並反對「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引起左聯諸人聯合圍攻，此即著名之「文藝自由論辯」。論辯之初，先生孤軍奮戰，游刃有餘。數月後，蘇汶（戴杜衡）以「第三種人」參加論戰，二人力戰左聯，終使左翼文人承認其策略上宗派主義，理論上機械主義之錯誤。

一二八戰事後，旅滬學界成立「中國著作者抗日會」，先生當選為執行委員，起草《中國著作者為日軍進攻上海屠殺民眾宣言》，號召全民武裝抗日，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者宰割中國。

民國二十二年冬福建事起，先生本一腔抗日熱血，以十九路軍為當時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唯一有真實成就之「武力」，乃毅然投身福建之抗日救國運動，並終身為十九路軍之抗日榮譽辯護，不遺餘力。先生受閩省政府文化宣傳部工作，閩事失敗後轉往香港，遭香港政府逮捕，以「自由離境」為條件釋放，乃赴英倫，在倫敦大英博物館讀書，吸取新知，並遍遊西歐各國及蘇俄。後應第三國際中國代表團之邀，至莫斯科參加《救國時報》、《全民月刊》編輯工作，鼓吹統一抗日。然而先生對蘇俄研究愈深入，對唯物史觀及社會主義愈加懷疑，在俄拒絕王明（陳紹禹）勸其加入共產黨之要求，返回倫敦。後與旅歐學界在布魯塞爾成立「世界和平運動總會」，在巴黎成立「全歐華僑抗日聯合會」，並草擬成立宣言。二十五年

冬先生本擬買棹經美回國，途中聞西安事變，遂暫留美國。

蘆溝橋戰役掀起我全國抗戰序幕，先生立即束裝歸國，在漢口辦《時代日報》，主張「鞏固統一，抗戰到底」。無奈戰事逆轉，武漢失守，不得已結束《時代日報》，隨政府西遷重慶。成立「時代日報印刷出版社」，出版《祖國》週刊。復以邵力子介紹以參議銜爲重慶行營主任張群撰稿。行營結束後，張氏改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以先生爲秘書，復因葉楚傖之介重新加入國民黨。十九年張群奉調爲四川省主席，秘書長一職先後由陳布雷、王寵惠繼任，對先生益加倚重。國民參政會成立，自第二屆起，先生連任參政員，讜言諍論，風生議席，深得儕輩之推重。後當選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委員。其間主持《外交季刊》，創辦《民主政治》月刊，對戰時軍事、政治、外交、教育頗多建言。

勝利前夕，美、蘇威脅我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放棄滿蒙主權，宋子文、王世杰等在莫斯科多次談判，而對國人諱莫如深，先生偶知其事，以爲「外蒙斷不可失，此約萬不可訂，否則八年抗戰之功付諸東流」。乃草成備忘錄轉請陳布雷、宋子文、王世杰呈送最高當局，未獲回應，乃印發傳單：《參政員胡秋原對中蘇談判之聲明》，致送各報館及參政會駐會委員，並當街散發。另以英文信致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抗議。赫使請見先生於使館，始而盛氣凌人，經先生抗顏力爭，遂改容相向，譽先生爲「中國人中罕見之勇者」。最高當局震怒，下令扣押《聲明》，並「免胡秋原本兼各職」。「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先生之舉不讓韓文公專美於前。

抗戰勝利，先生返鄉恢復前川中學，並任校長。三十五年底參加制憲國民大會。三十六年至上海就任《東南日報》總主筆，並兼《前線日報》、《時事新報》主筆，同時在暨南大學講授國際問題、復旦大學講授西洋哲學史。三十七年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翌年局勢逆轉，國共和談破裂，林彪部隊由平漢路南下，華中剿總不戰而退，武漢情勢混亂，先生不願為中共驅使，乃化裝小販，隻身經長沙至廣州，應《香港時報》許孝炎之聘，赴港任主筆。並為卜少夫之《新聞天地》、徐復觀之《民主評論》撰稿。

居港期間，親共訪客數度勸先生回國，先生不為所動，然以家小尚在大陸，安全可慮，一度離開《香港時報》，以養豬、開洗衣店、賣腐竹維生。先是余太夫人早於抗戰時仙逝重慶，三十八年康民公輟轉由家鄉攜先生二弟業永之子，康民公長孫孫翼同至港，未幾胡夫人亦由北平攜子女歷劫來聚。至是先生無所顧慮，以真名為文，反共抗俄，字字珠璣。先生謝絕共黨遊說之使者：「在國民黨勢力最盛之時為國民黨之敵……在共黨將被消滅時，為共黨之友……素不信革命不革命、階級不階級之說，祇有君子與流氓之別。國民黨亦有流氓，然尚可理論，有所忌憚」，自謂或為街頭賣字而著書立說，或為養豬種菜，四海貿易皆能養家活口，自是遊說之使絕跡。

韓戰起，先生發表「俄帝欲自殺於對馬乎？」於中央日報，並結集論蘇俄歷史文化、虛無主義、國際局勢、韓戰趨勢各文為《俄帝必亡論》，與《中國之悲劇》並列暢銷書，甚受中共注意，欲購買版權為先生所峻拒。三十九年冬先生舉家遷臺，應中華文化事業出版會之

請，完成《俄帝侵華史綱》。受最高當局囑託，翻譯共產國際六次大會全部文件，並起草《反抗俄基本論》。時文化界流寓香港人士籌辦《自由人》三日刊，相約以真名撰稿，支持自由中國，先生亦與焉。國民黨刊物《今日大陸》聘為名義發行人。此一時期之著述可分為四大類：一為有關自由世界，二為有關自由中國，三為關於蘇俄與中共，四為有關學術思想，及知識分子乃至自身之思想生活。自民國三十九年起為先生著作最豐富之時期。

民國四十二年康民公以肺癌辭世，享壽七十四歲，先生哀慟逾恆，守孝期內完成《古代中國文化與中國知識分子》一書，乃康民公生前所期盼者。此書一出，望重士林，朱家驊乃禮聘先生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主編《近代中國對西方及列強認識資料彙編》及《中俄檔案》。

民國四十五年，成舍我創辦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先生應聘講授現代世界史、思想自由史。同年赫魯雪夫發表秘密演說，斥責史達林暴行與無能，先生認此為當世最佳反共文獻，立即譯出並加註解以為共產主義崩潰之兆。四十九年《自由中國》雷震案發，先生與成舍我聯名主張雷案應交付司法審判，並發表「同舟共濟」於民族晚報，大違當道之意。先是蔣總統於四十五年冬指派先生任聯合國中國代表團顧問，會後於遊歐途中偶遇時任職中共政府故友，兩次晤談。事隔三年，遭人誣陷，以先生與中共往來。蔣總裁批示查詢，幸黨國元老馬超俊、吳忠信、何成濬等先生挺身辯護，事情真相乃大白而告終。

《文星雜誌》創刊之始，先生亦為撰稿者之一。民國五十年《文星雜誌》發起中西文化討

論。翌年先生應邀在文星發表「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先生除精通諸子百家外，對當世西洋哲學鑽研極深，對數理邏輯、物理、基因學之發展亦甚為了解，其超越前進之理論，乃積數十年深思實學之功力而成，其博大精深，苦心孤詣，固非常人所能體會理解。不想以此為主張「全盤西化」之西化派詆毀，並因此對簿公堂，纏訟達四十年。先生為使自己之主張能廣傳於國人，乃於五十二年創辦《中華雜誌》，主張由學術探討中國前途，提倡「人格、民族、學術」三大尊嚴。五十七年完成《復社及其人物》一書，介紹中國知識分子面對國家歷史文化存亡繼絕時所表現之生命精神。民國六十六年，「鄉土文學論戰」起，先生著文支援鄉土文學，並邀鄉土文學派作家參加《中華雜誌》。民國六十九年高雄「美麗島事件」作，《中華雜誌》社論引雨果「赦免是人類言語文字中最高貴的」，呼籲政府要「和氣致祥」，對涉案人士寬大處理。黨外人士多銘感於心，親赴胡府致謝。至珍寶島事件發生，中共正式與蘇俄分離，先生有鑒於中國必須統一始能富強，立足於二十一世紀而不敗，因而力主兩岸和平統一，重建國家。民國七十七年春「中華統一聯盟」成立，盟員公推先生為榮譽主席。同年九月先生由美返大陸探親訪問，與大陸各界討論民主統一問題，當時為臺灣知名人士公開赴大陸呼籲和平統一之第一人，被譽為「兩岸破冰者」，引起海內外之迴響。亦因此遭國民黨李登輝主席開除黨籍，此事引起部分黨員集體退黨，而黨外人士則惡顏相向，甚至以身體傷害要脅，意圖嚇阻先生在立院發言。八十一年《中華雜誌》以先生體力不佳及財務問題停刊，後改出《中華季刊》，亦於八十二年正式停刊，探討學問，議論國是凡三十一年。

綜觀先生一生，自十七歲參加《武漢評論》為編輯起，至九十歲因目疾淡出寫作止，終日埋首書堆，伏案為文，數十年如一日。嘗云「文章報國」四字可為其一生之寫照。先生少時即以明儒顧亭林「明道救世」為志，個人思想立論亦隨其博覽群書及遊歷思考而不斷增長晉悟。先是醉心於樸列汗洛夫之唯物史觀文藝論，繼由馬克斯主義唯物史觀轉而主張「自由主義的馬克斯主義」，自稱為「自由人」，即思想自由，文藝自由。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在西歐、蘇俄及美國遊學觀察後，又放棄自由馬克斯主義，認「歷史與哲學為世上學問之兩極，前者明萬物之過程，後者求萬化之原理」，標舉其思想為「新自由主義」，其歷史哲學為「文化史觀」。

中蘇條約對先生思想是一大衝擊，先生痛感國家任人侵侮，而知識分子喪失理想，墮入現實主義，於反覆思維之後，對歷史哲學又作更大的修正，放棄文化史觀，改稱「理論歷史學」，包括史學方法論和價值判斷論。至此先生歷史哲學思想趨於圓融，提出「人格尊嚴、民族尊嚴、學術尊嚴」的主張，先生「希望中國超越傳統主義、西化主義、俄化主義而前進，中國人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世界問題，用自己的腳走自己的路」。

先生更以書生問政，自民國三十七年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至民國八十年依《第一屆資深中央民意代表自願退休法》退休止，議壇生涯長達四十餘年。其間為國是問題，書面提案與口頭質詢不下數百萬言，每每慷慨陳辭，語重心長。犖犖大者有三十七年為應付共軍緊急攻勢之提議「充分檢討時局，商討有效步驟，採取切要措施，以救急局而安國本案」及「第二

國難之由來與挽救之根本問題」，民國四十三年「論政府不可頒行簡體字」，四十四年與成舍我共同爲「龔德柏案」提出資詢，嚴正要求政府保障人權及言論自由。四十七年《出版法修正案》，力主開放雜誌申請，保障新聞自由。五十九年「進行發展人造衛星計劃」，民國六十二年「我國對中東戰爭應守嚴格中立態度」、「最後外交危險之到來與革新之緊急必要」、「我國經建必需全盤檢討重定計劃」。七十六年有「國內新聞自由」及「中國問題及大陸政策」兩案，後者闡明今後三年是中國以民主統一思想運動解決中國問題之歷史時機，建議政府放棄「三不政策」，與中共談判和平民主之統一問題。民國七十七年「當前中國之根本問題」，民國七十八年「大和平方案」、「統一國家與建設臺灣」，民國七十九年「立刻展開兩岸統一談判始能撥亂反正復興中國」等等，屢屢漏夜趕寫書面質詢文，愛國憂民之忱躍然紙上。先生曾多次應國防部之邀至金馬及全臺各部隊駐地演講，申論反共抗俄，鞏固並振奮軍心。或聞軍中清貧實況，數度向中樞建言，儘速改善軍人待遇。

先生爲人宅心仁厚，「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承傳庭訓「勤儉立身，仁恕接物」，並以此語告誡子女。生活雖不寬裕，但凡有貧困求告者，必慷慨解囊。或有請託推介伸訴者，必盡力協助。先生在家則孝敬父母，友于兄弟，處世則忠於所信仰之原則觀念，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特立獨行。自言「清苦如頭陀，平淡如隱士，慘淡如難民」，誠大智、大孝、大仁、大勇之士。古人云：「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先生當之無愧。

先生七十年初罹患冠心病，七十一年春赴美接受心血管繞道手術。八十九年三度因心律

不整急診。比歲以來，年事日高，體力亦不如前。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因肺積水入耕莘醫院住院，二十五日心臟病復發，心律不整，當即轉加護病房。子女五人，兒媳暨孫等凡在國外者均兼程返臺省視。其間先生病情時有起伏，於五月二十四日晚八時以心肺衰竭，溘然云逝，遽歸道山，享壽九十有五。哲人其萎，哀思無盡。

德配敬幼如夫人，盛唐五王敬暉公之裔，祖籍浙江山陰，先世遊宦於蜀，設籍成都。北平女子師範大學英語系高才生。民國二十一年在上海于歸先生，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相敬相愛凡七十二載。抗戰期間執教於綿陽女中及第二女子師範學校，擔任重慶觀音岩小學校長。所生子女六人，長女采薇夭殤，餘均夫人躬親撫育，備極劬勞。公子卜凱爲美國賓州天普大學物理碩士，秉承先生愛國抗日之素志，六十年代保衛釣魚臺運動初期即參與推動，現任職華冠通訊。女公子采禾、蜀石、蜀山均留學美國並獲博士學位。采禾、蜀石已退休，蜀山現爲美國紅十字會費城分會器官及骨髓移植研究部主任，幼女卜旋學業有成，現任美國馬里蘭州蒙郡學區傳媒部專員。四女俱適望族，快婿亦皆飽學事業有成之士。先生夫人撫育胞姪翼同如己出，翼同夫婦亦甚賢孝。先生一生致力學問，憂心國事，清廉自持，每有饕餐不繼之苦，孝親育兒端賴夫人。尤以先生避赤隻身赴港後，夫人攜稚年子女四人由黃陂而漢口而北平，關山萬里，歷經坎坷，並峻拒中共之利誘，輾轉由平漢路經深圳逃港，智勇兼備，非一般家庭婦女所能。先生一生成就，夫人鼎助之功多矣，先生壽逾耄耄，著作等身，早有傳記及紀念文集行世，此事略未足以及其萬一。

沈雲龍先生序

由於濫竽大專中國近代史講席十餘年，我深深感到一般青年學生對近代史知識之模糊與缺乏，至堪驚人，大有江河日下之勢。小而言之，如把鴉片寫成鴨片，和坤寫成和坤，王鑫寫成王鑫，嘉慶誤為嘉靖，東學黨誤為東林黨，以及咸豐十二年，同治十四年之類；大而言之，對有清一代中央和地方的官制，八旗和綠營的兵制，取士用人的科舉考試制度，以及相關的若干專有名詞，幾乎是茫無所知。至於自鴉片戰爭以還，若干內憂外患的慘痛史實，能夠聯貫起來，分析其來龍去脈，前因後果，指陳得失，明辨是非，說得不太離譜，而且層次分清，時間不致倒置，那更是絕無僅有。這較之三十年代普通中學生所能了解者，其相去之懸殊，是不可以道里計的。

試問國家處於屢年憂患之中，生而為中國的讀書人，竟不了解中國歷史盛衰之關鍵，已覺可羞，乃至生而為近代中國的智識青年，竟不了解近代中國歷史積弱之癥結所在，反而要跑到國外去，向素來不利於中國的所謂「中國近代史權威」洋教授請益，以致被牽著鼻子走，漸失本真，面目全非，乃至忘卻民族的自尊，跟著胡兒罵中國，這不能不說更是無比的

羞恥。如此年復一年的下去，我們的國家民族觀念，如何能在下一代智識青年中生根？又如何能向每年大量湧出國門甚而一去不復返的留學生群中，喚回其日漸消失的「國魂」？更無怪乎有若干民族渣滓，竟忘卻本身同是炎黃子孫，而要在海外搞什麼「臺灣獨立」運動了。這一切的一切，俱足證明我們的歷史教育的嚴重失敗，還不值得警惕嗎？

我嘗推原歷史教育失敗之故，固由於一些官封「白牌教授」本身之不求甚解和教學不得其法，而缺乏合乎水準的教材，也是重要的因素。即以李劍農先生的《中國近百年政治史》而言，是大家公認的一本好書，迄今尚無有出其右者，可惜重點偏在政治史的一面，而時間又僅敘至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為止，對於近百年來外力的侵入，造成國勢不振，由排外到畏外、媚外，由妄自尊大到妄自菲薄之由來與經過，似未能一貫的予以扼要說明。尤其二次大戰前後，日俄之交相侵逼，漢奸、中共之裏應外合，使國家遭遇歷史上互古所未有之一大變局，這中間許多重要史實，在李書中都付闕如，未能及時增入，不能不說是美中不足。

今年春間，偶然從舊書攤上買到胡秋原先生一本大著《近百年來中外關係》，是抗戰勝利前二年在重慶出版的，完全土紙印刷，令人想念抗戰艱難的陳跡。我曾將這本書詳閱一過，其內容始於中英江寧條約，終於中英美平等新約，將一八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為時一百年的中外關係，分為十五章，提要鉤玄，條分縷析，予以系統的敘述。除首尾兩章外，每章之末，均有評論，這完全是司馬溫公寫《資治通鑑》的筆法，不僅可以看到胡先生對每件史實精闢的見解，而且與我平日講授近代史時的重點發揮，有甚多的暗合，可謂先獲我心，大有「相

見恨晚」之概。我覺得這本書正好可以彌補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之闕失，而且應該兩者合觀，對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人，將是入門的階梯，而不致迷失路途，茫無所歸；因而慫恿胡先生重印，以廣流傳，胡先生經過考慮，甚以為然，終於接受我的請求，私衷是極感欣幸的。

胡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即已馳騁文壇，名震公卿，而且語驚四座，當者披靡，往往下筆萬言，不能自休。一生寢饋於文、史、科、哲的研究，博極群書，含英咀華，等身著作，千秋專業，遠非今日欺世盜名的所謂「學人」、「院士」、「講座教授」之流，所能望其項背。即如胡先生在這本書的臺灣版自序中，指陳中國悲劇之由來，是百年來洋人壓力和自身愚弱的後果，而我們受外力的壓迫，卻求出路於「西化」與「俄化」，以致形成兩種錯誤的外交觀念，因應失宜。胡先生並且認為「他們的錯誤，乃根本不曾對世界歷史與文化作比較研究，不知中國與世界變化之由來，不知中國失敗之過程。他們根本無力由洋人的『觀念侵略』解放。西化派只知西洋文化之成就，而不知其勢利主義與弱點，因而奉西洋為神明；而俄化派能蔑視西洋，可是其本領又只能對蘇俄和馬列下跪。」這真是一針見血，鞭辟入裏之談，像現在挾洋人以自重，遇金圓而低頭甚而徘徊於雙重國籍之間，左右逢源的「學人」、「院士」、「講座教授」者流，縱能有見及此，又怎敢出諸其口。我一向是徹頭徹尾贊同「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國家主義者，對標榜書生從政而實則登龍有術的，如蔣廷黻之顛倒是非，賤林則徐而揚琦善，故意為屈辱求和者張目；王世杰之庸妄無知，竟以「美蘇橋樑」自居，